

试论严歌苓小说对女性意识的多元发掘

祁晓亮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严歌苓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当代华裔女性作家,她在过去近30年创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我国的现当代文学奉献了多部经典作品。严歌苓人生阅历丰富,对待创作的态度严肃、认真,作品中对女性人物的描写尤其令人称道。她在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对历史、时代、人性的理解,并且对此有着艺术化的展示。她以自己独到的眼光和细腻的情思对不同女性的心理世界进行关照,通过几十年的艺术探索,同时结合自己的感性经验对女性世界进行了新的诠释。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形象;女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6-0084-02

在我国璀璨的文学作品的海洋里,散见于作品中的一颗颗刻画女性的零珠散玉无不闪烁着女性意识的光芒。无论是从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所描述的女性形象,还是到“唐宋女诗人、词人的文学成就以及明清‘才女’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萌发,都是在男性社会秩序的规范下书写完成的。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女性,不是永远沉默着潜隐在历史的背后,就是被迫按照既定的话语模式发言”。即便如此,《诗经》以后的我国文学传统中对女性意识的表现一直未曾停下脚步,新文化运动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洗涤文学传统中固定形成的创作规范,“五四”后对女性意识的描写更加符合时代特色,而且也更加充满人性的张力,萧红、丁玲、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发出了对人性本质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呼唤,可视作是在继承《诗经》以来女性意识表达传统的基础上一轮表述女性意识的冲击波。现代文学30年间,作家们女性意识的集中表达,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女性文学的成熟,与其余类型的文学相得益彰,共同推动新文学取得丰硕的成果。当然,女性文学在曲折中前进,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普遍遇到的困境,随着政治对文学持续地干预和影响,解放以后在许多作品中,女性意识似乎呈“失语”的状态,且这个趋势愈演愈烈,一直到改革开放才得以重新焕发生机。以张洁、王安忆、林白、陈染等为代表的当代女性作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作品中将被遮蔽的女性意识爆炸式地彰显出来,无疑是对现代女性文学中继《诗经》以后女性意识传统的继承和对其在政治话语中长期被消解、遮蔽的全面反抗。而移居国外的严歌苓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不同于大陆本土女性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她的作品中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从严歌苓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体会到她独特的女性意识,她不仅提倡女性应该具备中国妇女传统的温柔善良、坚韧顽强等优秀品德,更欣赏女性追求人格独立,追求自我价值的现代精神。

严歌苓在小说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不同身份的女性在各自特殊的生存状态下所带给读者的女性意识,或体现女性生命的尊严,或表现出女性本能的生命延续,或宣泄女性不满宿命的反抗等,而这一切都表现出她们没有在各自生存的环境中迷失、停顿,而是以一种鲜明的个性、卓然超群的姿态,展示着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

一、生命本体的尊严意识

对女性生命尊严的维护是历代文学作品共同的母体。讴歌生命,彰显生命的价值,表现女性人物形象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人生抉择,在正义面前的舍生取义,并且能勇往直前地追求理想,这在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但是像严歌苓把一群“特殊女人”,也就是风尘女子置于战争的背景下,多层面、多角度地挖掘她们生命本体的尊严意识是屈指可数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的苦心经营之作。在“南京大屠杀”的腥风血雨中,13个秦淮女子为了躲避战乱,为了保全自己,为了今后还可以过着吃香的、喝辣的生活,撞进了坐落于南京的一家美国教堂避难。她们昔日的搔首弄姿、万般风情以及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和唱诗班的童女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和唱诗班的童女们构成了不可调解的矛盾,她们成天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对童女们大打出手,恶语相加。当一颗罪恶的子弹穿透教堂的玻璃,穿过一位童女的脖颈,童女倒在血泊中的时候,当童女们把藏进地下室的机会让给这些秦淮女子的时候,当童女们为拒绝参加日本人庆功大会的演出,集体准备跳楼的时候,她们才恍然大悟——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在生死面前,这13个秦淮女子把生的机会留给童女们,她们却毅然决然地代替童女们前往死地,以死抗争,以生命来捍卫生命,维护了她们生命的尊严,同时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事实上,生命的尊严始终是严歌苓以小说探讨的感人至深的主题。她的《小姨多鹤》是讲述跨越20世纪40年代

到 80 年代的生命故事:《小姨多鹤》中的日本女子多鹤,在二战结束之际,在同村的所有日本人全部集体自杀的情况下,被东北一个张姓人家所救,从此历尽艰辛,以暧昧身份在张家生存下来。换句话说,是张家两代人超越中日的国仇家恨挽救和保护了一个生命。张家有一个现实目的是让多鹤为张俭(已有妻室但不能生育)生儿育女,多鹤毅然说:“可以的,我什么都可以,我的命是你们给的。”救命之恩当以几十年做牛做马相报,此非虚言。生命的神圣高于一切,这就是严歌苓以一个海外作家的宽阔视野和浑然大爱所传达出来的生命尊严意识,这也是严歌苓笔下各种女性形象最为光彩夺目的艺术魅力。

二、生命本体的延续意识

正是由于严歌苓对女性个体意识的重视,以及她作为女性在天性中对于母性的认同,使得她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着十分清晰的生命的延续意识。

小说《扶桑》里,女主人公扶桑是个被拐骗到美国却有着惊人生命力的妓女。作者在描述这个人物形象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和别的妓女进行比较,惊奇地发现扶桑是当时的风尘女子中惟一个活到相当寿数的人,她像瓦砾下的小草,倔强地生长着。扶桑在挨打时隐忍退让,在被强迫时表现出顺从,正是这种天性上的逆来顺受,使得扶桑像杂草一样顽强地活了下来。强大的生命张力和包容一切的宽广胸怀让所有的人都在这个身份卑微的女人面前显得猥琐枯槁,扶桑是东方女性中生命力顽强的代表之一。《第九个寡妇》中的村妇王葡萄所生活的场景是当时中国乡村普遍情态的模拟,她在地窖中藏匿公公数十年,经历了灾荒、饥荒以及各种政治运动的考验,但是这个顽强的女人漠视周围的一切,只为了生命的延续,用王葡萄自己的话说:“这里什么事都发生过:兵荒、粮荒、虫荒、人荒,躲一躲,就躲过去了。”王葡萄就是用单纯的逻辑处理着瞬息万变的生活,而这个逻辑的核心就是生命的延续。

三、宿命下的反抗意识

历史的重荷、时代的风雨让中国女性经受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也磨砺了她们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的坚韧品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都活跃着她们不屈的灵魂。严歌苓当

然毫不例外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类坚强的女性。她总是让女主人公经受着生活的考验,在生存的压力中凸现出女性坚韧顽强的人格风采,展现个体欲望的宣泄,充分体现出她们宿命中的反抗意识。

《雌性的草地》是严歌苓赴美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很看重的一部作品。小说主要讲述了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女子牧马班的故事。她们承诺了某个伟大的遗志,却必须要以牺牲、献身来作为代价,她们只是把牧马事业当成自己的惟一,可是她们不曾知道,正是这被认为是崇高的职业,却让她们成了悲剧的牺牲品。在小说的自序中,严歌苓讲到:在那个年代,“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性’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写此书,我似乎是为了伸张‘性’。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沈红霞,作为军人的后代,把她的牧马事业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自己的生命,“奉献”两个字已经内化成她的灵魂,她的观念和信仰也已经完全理想化。可是作为女性,沈红霞本能地也渴望自由,渴望追求真爱,也有着强烈的追求生命与生存的权利,可是在那个异化的年代,欲望被压抑,人性被扭曲。最后她对牧马事业几乎有着病态的坚持和执着,将自己全部的感情倾注到一匹红马身上,“红马”已经是她的初恋对象,是她的情感寄托和精神支柱,只有“红马”才领略到了她女性独有的柔情和爱抚,并且饮了她浴洗全身的水。沈红霞就是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展示着她对生命的欲望,展示着她的性爱美,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出自于女性的本能,是女性宿命下的一种反抗形式。

总之,严歌苓小说中对女性人物的塑造以及对这些人物意识的多元发掘,并不是把人物置于广阔波澜的历史事件中,也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置人物于平常的生活场景中,通过这些人物的举手投足和音容笑貌,让读者通过文本的阅读,从中领略和触摸人物形象所蕴涵的生命意识。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正是在她作品中绽放出神秘耀眼的光芒才让世界充满着生存的智慧与理性,正是这些性格迥异的女性诠释出的生存状态的丰富与多元,她们对生命的重视和精神的救赎以及宿命下的反抗,让我们即使在污浊混乱的年代里也能看见烛照心灵的亮光。

[注 释]

①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9 页。

②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 2006 年版。

[参考文献]

[1] 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2] 倪立秋.新移民小说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3] 严歌苓.少女小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严歌苓.雌性的草地·从雌性出发(代自序)[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

[5] 陈瑞琳.冷静的忧伤——从严歌苓的创作看海外新移民文学的特质[J].华文文学,2003,(1).

[6] 严歌苓.谁家女初养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7] 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8] 肖红.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形象所体现的女性意识[J].中国学术,2007,(5).